

赵明义 著

社会主义论

基础理论·在当代中国·在当代世界

SHE HUI ZHU YI LUN:
JICHULILUN · ZAIDANGDAIZHONGGUO · ZAIDANGDAISHIJI

- 山东省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与当代世界”的最终成果第二部
- 山东大学硕果基金资助项目结项成果
-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相关‘主义’比较研究”(09&ZD002)阶段性成果

社会主义论：

基础理论 · 在当代中国 · 在当代世界

赵明义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社会主义论:基础理论·在当代中国·在当代世界/
赵明义著.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1. 9
ISBN 978-7-209-05543-7

I. ①社… II. ①赵… III. ①社会主义—研究
IV. ①D091.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15053 号

责任编辑:张素梅

社会主义论:基础理论·在当代中国·在当代世界
赵明义 著

山东出版集团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 址: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250001

网 址:<http://www.sd-book.com.cn>

发行部:(0531)82098027 82098028

新华书店经销

青岛星球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规 格 16 开(184mm×260mm)

印 张 66.75

字 数 1450 千字 插页 5

版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次

ISBN 978-7-209-05543-7

定 价 12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调换。电话:(0532)88194567

自序

读者看到的这部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约一百几十万字的厚书，是山东省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与当代世界”最终成果第二部、山东大学硕果基金项目结项成果、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相关‘主义’比较研究”(09&ZD002)阶段性成果，也是作者的一部文集性著作。虽然水平有限，但它饱含着作者几十年的心血。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的90岁生日，作为已有60多年党龄的普通共产党员的我，以此“心血之作”献给我们伟大的党。

作者，今年已是79岁的老人，按中国的虚岁习俗已经八十。1932年9月10日，出生在河北省景县冯高堡村，那是老解放区的一个小乡村。我出生的前一年(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国主义侵占了我的祖国东北三省——黑、吉、辽；我出生后的五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军国主义将侵略战火烧向全中国；与此同时，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全民抗日开始。我是出生在战乱年代，成长在解放区内。1938年~1946年，断断续续上了八九年小学。1947年1月参加革命，在本村任公办小学教师，并兼任小区青少年与学生联合会主席。1948年到1950年6月，在景县师范深造。194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队伍里，已工作了64年；在党内，直接接受党的教育、培养、考验和从事党的理论宣传、教育、研究工作，也已62年。我的一生可以说是从教的一生，仅在高等学校就已执教51年。在我这60多年的工作经历中，也曾有过其他的选择：1950年至1954年在景县区委、县委工作期间，先是报名“南下”赴广东阳江搞土改，县委已同意，可地委认为我作为青少年参加过土改，但没有独立地领导过土改，未被批准；朝鲜战争爆发后，我又报名抗美援朝，批准后编入新兵连训练，任连副指导员。后因朝鲜战局发生了有利于我方的变化不需再派新兵，愿望又没有实现。如果前一个选择实现了，那我现在就是一个离休党政干部；如果后一个愿望实现了，那我就是革命军人，很可能是早已牺牲了的革命军人。1954年，调往中共河北省沧州地委宣传部工作。先在宣传科，后在教育科，独自一人负责编辑地委机关报——《支部建设》。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党发出“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并动员有条件的青年干部可志愿报考大学。对此，我心潮澎湃，虽然我只上了不到两年的师范学校，没有受过正规的高中教育，但因我多年来一直坚持自学，除了数理化之外，语文、政治还是有较好的基础的。所以，就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专业本科。很幸运，被录取了，从此就进入了神圣的高等学校殿堂。苦读四年，学业成绩优良，毕业论文优秀，并获“优秀毕业生”证书。大学期间，在著名杂志中国人民大学学报《教学与研究》发表了一篇题为《正确对待新生事物的伟大榜样》的论文，也是我一生中第一篇正式的科研成果。毕业后留校任教，分配在马列主义政治学教研室，承担“科社名著”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等课程的教学工作，兼任越南留

学生班班主任和北京市委干部学习班班主任,参与编写《马列主义政治学教科书》。1958年,成老(仿吾)调山东大学任校长。1960年筹建山东大学政治系,因缺乏教师,请求中国人民大学支援。1962年9月,我同一批原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师一起来到山东大学政治系任教,被分配到政治学教研室,仍然承担在中国人民大学承担的那两门课程,积极参加《马列主义政治学》教材的编写工作,承担了大部分章节的撰稿任务;还在老教师的带动下,努力参加科研工作,来山大两年多时间,就在《文史哲》和《山东大学学报》(社科版)发表了三篇论文。当时山东大学党委和校长对新成立的政治系非常重视,成仿吾校长亲自兼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研室主任,他的夫人张琳教务长兼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刘岐云副书记兼任中共党史教研室主任。他们不仅兼任教研室的职务,还经常参加教研室的教学研究活动和给本科学生讲课,成仿吾校长就曾不断给政治学专业本科生讲授《共产党宣言》。山东大学政治系的学术环境较好,在这里工作心情舒畅。除了完成正常的教学科研任务之外,有时还给全校师生搞时事政策讲座。

1964~1965学年,赴曲阜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5年秋,我被校党委任命为政治系党总支副书记(并兼任政治学教研室政治主任),分管学生工作。1966年春末夏初,由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首先受到冲击的是高等学校,在高校受到冲击的又首先是学生政治辅导员和分管学生的副书记。本人在“文革”中受到了冲击,也经受了锻炼和考验。1970年暑假后,被重新安排工作,在学校政治部宣传组担任军宣队的副手,并兼任马列教研室主任。1976年夏,下农村“学大寨”一年,任一个村的工作组组长,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人拉犁耕稻田,人拉石头搞水利,更重要的是帮助村里清理财务、整顿领导班子,健全基层组织,又经受了一次锻炼。对于搞社会科学教学和研究的人,也是理论和实践结合的好机会。“学大寨”返校后,被任命为山东大学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分管理论宣传与教育工作。1977年,原政治系的哲学与经济专业分别独立建系。部分原政治专业的教师希望我同他们一起筹建政治学系科,我个人也很愿意回系教书。粉碎“四人帮”后,时任中央党校校长的胡耀邦同志,力主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的科学社会主义学科独立出来,并成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专门教学机构。当时任中央党校顾问的成老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后,由他主持在中国人民大学也成立科学社会主义系。从此,科学社会主义作为一个学科,在当代中国结束了被其他学科代替的历史,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在这种背景下,我向校党委和校长提出山东大学也应在原政治系政治专业的基础上,建立科学社会主义系,学校领导批准了我的建议,并任命我为科学社会主义系筹备小组组长。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建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系,我任系党总支书记和系主任,并于1979年暑假招收了第一届科学社会主义专业本科生。在筹建科学社会主义系的同时,在国家与省有关部门和学校领导的支持和关怀下,以我为主,筹建起了“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创办了《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1984年创刊时,老教育部部长、国际问题著名研究专家,世界社会主义问题著名学者钱老(俊瑞),亲笔写下发刊词。该杂志近30年来,在国内外影响越来越大,成了著名期刊,是全国唯一以此命名的专业杂志。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和《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及其取得的优异成绩,为后来被批准为“国家教育部百所重点

研究基地”之一——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基地和科社与国际共运专业成为国家重点学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筹建科学社会主义系的同时,我开始了《科学社会主义》教材的编写工作,并于1980年6月由山东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了我主编的《科学社会主义》(即“初版本”,全书35万字、个人执笔16万多字)一书,这是当时全国第一本系统阐述科学社会主义的著作和教材。当然,水平有限,更不能和后来出版的高水平的科学社会主义著作和教材相比。中央党校范老(若愚)和江流同志主持编写《科学社会主义概论》时,我们这本教材作为参考,编写组成员人手一册,并让我们系派了一名专业教师(即杨尊明教授)参加了编写组。在我们的《科学社会主义》(初版本)正式出版、并立即用于我系科学社会主义专业本科生教学的同时,在全国广泛征求意见,准备修改该版本。为此,1981年7月,我们特邀了全国部分高等院校、党校、军队院校和科研单位的专家、学者,在山东烟台召开了《科学社会主义》教材讨论会,认真听取了对初版本的修改意见,并在与会人员的帮助下拟定了修改大纲。在此基础上,我们经过了一年多的努力,完成了对初版本的修改定稿任务,并于1983年2月由原出版社出版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增订本。该版本结构体系有了重大变动,由原来的十四章改为绪论、三编二十二章,规模增至55万字,质量有明显提高,社会影响逐步扩大,不少高等院校、党校、军队院校、管理干部学院选为教材,曾在香港参加展销,并交流到前苏联、德国、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国家的某些大学和人文科学研究机构,1984年获山东省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增订本第四次印刷的11年后,世界社会主义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1991年前苏联东欧和蒙古发生了剧变,11个社会主义国家改旗易帜,国际社会主义运动跌至低谷;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践上则蓬勃发展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理论上获得了一系列的创新与突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已形成,并得到了丰富发展。这期间,我和我的团队一直跟踪实践进行理论研究,并将研究成果随时用于教学,以不断修改《教学纲要》的形式,供校内本科生、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使用。自1993年起,又用了几年时间对增订本进行了修改,并于1996年5月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科学社会主义》新版本。该版本从体系设计到具体内容又有了很大变动,但规模缩小为44万字。出版后,受到读者和教材使用单位的欢迎,至今已印刷四次。我主编的《科学社会主义》一书,从初版本、增订本到新版本,共印刷8次,约9万册,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国家教育部将其列为“十一五规划教材”,我们的《科学社会主义》第四版将于2011年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1985年,我组织了由以我的团队为主,并由北京、上海的多名专家参加的当代社会主义问题教材编写组,用了两年多时间分工撰写,最后经我统修定稿,由山东人民出版社于1987年8月正式出版了我主编的《当代国外社会主义问题纲要》一书。2001年11月,我和我的团队又新编了《当代社会主义》一书,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两本书,既是我校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运专业本科生、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专业教材,在全国也有不少科社与共运专业硕士、博士教学点用作教材,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与此同时,在我主持下,还编印了300多万字的、供教学与研究参考的内部用书——《当代社会主义问题资料选编》(共五册六本),交流到中国社科院及各省社科院、中央党校及各省党校、各主要高校、各干部管理学院、军队院校,影响较大。我们还在山东济南、烟台等地举办了数次当

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讲习班,请国内外著名专家作学术报告,为培养当代社会主义学科教学与研究人员,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也受到了好评。30多年来,我在科学社会主义、当代国外社会主义教材编写和资料建设上,确实费了心、用了力,从我46岁开始,现已年近八旬,还在为此呕心沥血。不过,自己认为这是有意义的事业,所以乐在其中。

30多年来,我几乎一直都站在教学第一线:先是给科社专业本科和政治学干部专修科讲授科学社会主义原理、马列科社名著,领导科学、党的建设。1983年开始,除给本科和专修科讲课之外,又给科社专业硕士研究生和硕士生函授研究班讲授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专题研究、其他马克思主义名著——罗莎·卢森堡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组织问题》和《资本论》与科学社会主义等课程。1991年开始,给博士研究生开设科学社会主义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研究。我给学生讲课遵循的原则是:充分备课、把科研的新成果随时转化为教学内容、理论紧密联系实际,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努力做到生动感人、坚持启发式与讨论式,对学生严格要求耐心指导。一句话,绝不“混课堂”,误人子弟。1983年招收硕士生以来,至今已培养并毕业30多名硕士研究生。1991年招收博士研究生以来,已指导和完成论文答辩30名博士研究生,正在指导的博士研究生3名。在指导硕士、博士研究生过程中,我努力做到:在做人和做学问有机统一方面,以身作则,身教言教结合;对学生严格要求与热情关怀结合(包括学生生病、家庭困难等等,尽己之力、予以照顾);学生发生了问题,首先从自己方面找原因,然后再批评学生,并帮助学生查原因、找出改进或弥补的措施;在学生的论文选题、开题报告、撰写论文等环节,积极提出个人指导意见,尊重学生的独立见解;个人的科研成果、书籍资料、学术信息不向学生保密,同时,也告诉学生如何运用导师的成果。一句话,尽心尽责、不糊弄、不敷衍、不推卸责任。

我非常重视科学研究。30多年来,我已主持和完成了国家重点课题两项,一般课题两项,教育部基地重大课题一项;山东省省级重点课题两项、重大课题两项。2009年底批准的国家重大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相关主义比较研究”,正在进行中。出版学术著作、教材、辞书等20余部(个人撰稿约百万字),在国内外重要报刊发表论文60余篇。获得国家与省、部级优秀教学成果、科研成果奖者有十多项,其中,“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学体系”,获山东省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和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科学社会主义》(增订本)、国家社科规划重点课题结项成果《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谛》(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获山东省优秀社科成果一等奖;山东省社科规划重大课题结项成果《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获中国高校第四届优秀社科成果二等奖(一等奖空缺);《当代国外社会主义问题纲要》(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科学社会主义》(新版本)、《中国共产党党务管理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获山东省优秀社会科学成果二等奖。我的科研生涯的重要特点之一是:重视团队建设,在集体奋斗中充分发挥个人的学术带头作用,既带动别人又学习别人,在产出科研成果的同时,又使青年学生和年轻教师逐步成长起来,成为独立的课题主持人。先后参加我主持的科研团队的年轻成员20余人,现在多数已成为教授、博士生导师和一些新学科的主要带头人。由一个科研团队变成了多个科研团队。这是我最高兴的,也感到很幸福。

※

※

※

※

我从事的是社会主义学科的研究和教学,主要包括三个方向:一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础理论;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是当代国外社会主义。现在同读者见面的这部著作,定名为《社会主义:基础理论·在当代中国·在当代世界》,它主要包括这三方面的内容和我在这几个方面所作的学术贡献。

关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学术贡献。

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有:四个版本的《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教育部基地重大研究课题结项成果《理论与实际结合: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当代化与本国化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务管理学》;代表性论文是:《论科学社会主义的本性与品格》、《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是科学性与阶级性的有机统一体》、《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创新中“因时、因地、因条件”三要素有机统一问题研究》、《科学社会主义研究中的十个认识问题》、《论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论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第二种设想的思想流变》、《要正确理解巴黎公社的原则》、《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含义、特征及其实质》、《“统一战线”概念探讨》、《认真研究新时期的统一战线问题》、《论工人阶级内部统一战线问题》、《战略与策略范畴探讨》、《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战略策略与社会主义建设战略策略之比较》、《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的研究对象和理论体系》,等等。在这些著作和文论中,作者提出了一些创新性的学术观点。比如:

——对科学社会主义学科的研究对象的界定与论证。这是该学科首要的、基本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该学科就很难独立地建设起来。30多年来,我一直坚持对其进行研究和完善。1978年,我在《文史哲》(第5期)发表了《试论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对象》一文,那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在我国第一次论述该问题的文章。当时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对象我是这样概括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性质、条件和一般目的的学说,是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产生、发展及其规律的科学,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这种概括,现在看来显然存在缺点:一是把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研究对象与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发展史混淆了;二是把恩格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对象的界定同斯大林赋予列宁主义的定义并列和等同起来,也是不妥当的。1980年,在我的《科学社会主义》(初版本)中,在对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对象界定时,克服了上述缺点,将其改为:“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表现。它是研究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性质、条件和一般目的的学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科社学界在进一步讨论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对象的问题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其他学科都将其研究对象界定为研究某种规律的科学,而科学社会主义学科是研究何种规律的。我积极参加了这一讨论,教育部主持的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的该问题研讨会上,我作了专题发言。后来,即1983年,在我的《科学社会主义》(增订本)中,将会议讨论这个问题的成果和我发言的内容予以吸收,对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对象的界定进行了完善:“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表现。它是研究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性质、条件和一般目的的学说,也即研

究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进程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1985年,在天津科社学界又召开了一次学科建设讨论会,对研究对象问题作了进一步探讨,几种观点都充分地进行了论证。我因事未参加此次讨论会,但会上的材料我都学习和研究了。1996年,在我的《科学社会主义》(新版本)中,参考了这次会议的研究成果。把我国科社学界自1956年起至1996年的40年间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对象的界定,经历的数个阶段进行了总结性的说明。为了更准确、更科学地界定该学科的研究对象,我把科学社会主义学科在我国已独立形成的七个分支学科,即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史、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运动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史、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代国外社会主义的研究对象,分别予以界定,认为我们通常所说的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对象,是指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研究对象。对于这一研究对象,在该版本中作了较大的修改,改变了用恩格斯原文作为研究对象表述的做法,将其概括为:“科学社会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是关于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一般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本质及其一般发展规律的科学。”同时,在该版本中对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对象的新概括与增订本关于研究对象的表述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区别作了说明。指出其内在联系是:二者都是既研究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代替的自发的客观规律,又研究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为实现这种代替本身自觉的行动规律。因为,只有这两类发展规律在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实践中有机统一起来,才能实现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其区别和优点在于:第一,前者(新概括)是以揭示和阐述如何由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自身成长、发展的客观规律为主体,紧密联系研究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自身活动的发展规律;后者(即增订本概括)则是以研究无产阶级解放运动自身活动规律为主体,紧密结合自发的客观社会发展规律。第二,“新概括”把逻辑的横向和历史的纵向之关系体现得较好。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对象涉及两个社会形态,即资本主义或半资本主义、半封建的旧社会和在建构旧社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社会。从逻辑的横向和历史的纵向有机结合上阐述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本质及其一般发展规律。第三,新概括可以改变人们长期以来的一种看法,即认为科学社会主义就是研究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社会政治规律的科学。因为,尽管恩格斯使用的“无产阶级解放运动或解放斗争”的提法,既适用于以阶级斗争为主的社会发展阶段,也适用于不以阶级斗争为主直至阶级斗争完全消失的阶段,但人们的习惯理解总是,一提无产阶级运动或解放斗争,就认为其内容主要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这样理解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对象,是不符合其科学含义的。

——阐述了狭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结构,即由理论原理和策略原理两部分构成。指出:理论原理的活动领域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客观方面,揭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进程及其发展规律,主要研究科学社会主义诸原理的“历史必然性、必要性、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实践意义、基本内容及其实质”,回答“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策略原理活动的领域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主观方面,揭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这一伟大历史使命的自身行动的规律,研究科学社会主义诸原理的实现途径、方式方法等问题,回答“如何干”和“怎么做”的问题。这个问题在这之前,我国科社界是没有人这

样划分和阐述的。而我这样划分与阐述又是有充分理论根据的。我从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刘少奇的有关论述中,将他们从理论原理和策略原理两个方面阐述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与主张挖掘出来,予以论证。同时,还从革命、改革与建设的实际中探寻到实践依据。

——以“三个本质”(资本主义本质、社会主义本质、共产主义本质)和“三个层次”(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成长为共产主义社会)的一般发展规律,建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这样做,既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本来含义,又十分清晰地将逻辑的横向与历史的纵向有机地统一起来。这是构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种创新。

——在论述“两个必然”时,提出了应将“必然代替”(资本主义)与“必须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有机统一起来,并认为它是社会主义发展的一条规律性原理。这样的提法和论述,在我国科社学界还是首次。这样论述“两个必然”就能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就克服了长期以来人们认识上形成的一个误区:只知道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而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所强调的另一个观点,即没有资本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是为社会主义准备条件的,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

——在论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时,提出了应将共产主义目标的遥远性和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奋斗的现实性有机统一起来,并认为它是实现共产主义的一条规律性原理。如此提法和论述,在我国科社学界也是首次。这样论述共产主义的目标,就把正确认识和处理理论和实践、崇高理想与现实奋斗的辩证关系,就能克服宣传和讲授共产主义问题时,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一种错误做法,即只是空洞地、抽象地喊一些“远大目标”、“崇高理想”、“信仰和信念”一类的口号,结果使人们觉得共产主义离我们太远,与自己的现实不沾边,甚至认为是“渺茫的空想”。如果我们把宣传与讲授共产主义远大目标、崇高理想同人们的现实奋斗有机地统一起来,长期坚持下去人们就会改变上述错误认识,人们就会觉得共产主义就在脚下,它存在于我们工作、生活的丰富多彩的现实之中,自己的勤劳奋斗的每一份成就都能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正如毛泽东所说:“现在的努力是朝着将来的大目标的,失掉这个大目标,就不是共产党员了。然而放松今日的努力,也就不是共产党员。”(《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6页)

——在论述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最基本的品格时,回答了何为品格、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品格两个层面的科学含义。指出:在中文词语中的“品格”,是品质和风格的有机统一体。品质,即本性、本质,风格,即作风与格调。品质是内在的,不易被人感觉到;风格特点则是外在的,人们可以感觉到。内在之质靠外在的风格反映、体现,把两个要素有机地统一起来,用品格反映某一事物与人物,既可揭示其内在质的深浅,也可发现其外在风格的优劣。关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品格,作者用“一个本性”和“三个风格特点”予以表述。“一个本性”,即严整科学性、革命批判性、具体实践性、发展创新性四要素有机统一的工人阶级立场的理论表现;“三个风格特点”,即客观事实与主观原则有机统一、理论与实

践有机统一、理论体系的开放发展性与质的稳定性有机统一。

——在论述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是科学性、与阶级性的有机统一时,作者回答了如下问题: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无产阶级的阶级性是无产阶级独有的,而科学性是反映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客观真理性,两者如何成为有机统一?指出:要理解这个问题,需从两个方面进行探究。一是必须弄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所揭示和反映的是什么样的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马克思主义是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它所揭示和论述的客观规律性是多层次的、多方面的,是一个严密而完整的体系,但最主要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对于这类性质的客观规律性,社会上哪个阶级独有的特性能同它们在本质上相适应而不相违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在分析了社会上各个阶级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之后作出结论:只有代表先进生产力,用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更先进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生产方式代替资本主义的无产者阶级,才同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之科学性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代替的客观必然性,在本质上相适应而不相违背;二是必须科学回答为什么只有无产者之阶级特性同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科学性所揭示的客观规律性,在本质上相适应而不相违背的问题,还要回答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是否还保有传统工人阶级的阶级特性的问题。传统工人阶级的阶级特性主要是指“四性”:先进性、革命性、组织纪律性、团结性。而有人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已丧失了这些特性,在本质上同资产阶级的本性已“合二为一”,并“一体化为一家人”了。作者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结构、阶级结构、工人阶级的地位与作用等新变化的大量事实,系统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与传统工人阶级同点和异点之后,作出结论:当代工人阶级“变化很大,本性未改”;在财产占有方面,传统工人阶级“一无所有”,当代工人阶级“有也不多”,根本谈不到与资产阶级特别是与大垄断资产阶级“一体化为一家人”。

——在论述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创新问题时,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创新中因时、因地、因条件三要素有机统一”的命题。指出:在当代中国,一般都把与时俱进和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创新联系在一起。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之所以是发展着的理论,应当说其时间性是很重要的,将它和与时俱进联系在一起不无道理。然而,作者在思考这个问题过程中,总觉得不周延,乃至不太准确。因为,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最基本的观点,即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就明确地指出:他们学说的一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据此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创新应同因时、因地、因条件三要素有机地统一起来。

——在论述“与时俱进和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理论飞跃问题”时,提出研究理论的理论飞跃性发展问题,离不开时代和时代主题的转换,在同一个大时代或同一个时代主题下先后接替的人们,后者对前者的思想理论可以有所推进,有所发展,能产生一些新的理论成果,但绝不会发生飞跃性发展,即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是因为相同时代或相同时代主题之下,其使命、任务、要解决的大问题基本相同,因而所需要的理论武器也就

大体一致。据此作者认为,邓小平理论之所以对毛泽东思想产生了飞跃性发展,是因为时代主题发生了变化;之所以不能说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之间是飞跃性发展的关系,是因为它们是同一个时代主题下的理论。

——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我国科社学界在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方面产生了一些不太正确的认识。为此,作者在《文史哲》发表了《科学社会主义研究中的十个认识问题》一文,提出了须对“十个关系”辩证认识的问题。这十个关系是:学习、研究与信仰、实践,坚持、捍卫与发展、创新,成功、胜利与失误、弊端,纵向比较与横向比较,乐观估计与悲观估计,必胜信心与危机意识,传统与现代,反腐败与反自由化,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和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实行双百方针。

——在论述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问题时,作者在我国最早明确提出和系统论证了社会主义历史命运是理论、运动、制度三形态有机统一的命题,并以“社会主义是发展的理论”、“科学社会主义的两个七十年”、“苏东剧变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反两面镜子”、“科学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与工人阶级执政党是命运共同体”等问题,构建了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研究的理论结构和框架。为科社学界进行该方面的研究做出了自己的学术贡献。

——在回答为什么毛泽东在1956年所写《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和他主持制定的八大路线中,已正确解决了的理论与路线问题,而1957年之后又背离它们,犯了近二十年的“左”的错误问题时,创新性地提出:回答这个问题非常困难,原因又不是单一的,但有一点可以说是已被实践证明,即在前一个实践基础上总结出正确的理论,并不等于在下一实践中一定能够正确地实行它。因为不经过几次胜利、几次失败的反复实践,这种理论往往不能在认识上扎根,在全党范围内取得共识,在实践中真正实行,而且一旦发生一些突然事件(例如1957年波兰、匈牙利事件和中国的所谓的右派进攻问题等),就很容易离开已经正确认识了理论和路线。

——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统一战线理论,作者的研究比较系统、深入,并提出了一些新见解。《统一战线概念释义》(大百科《科学社会主义卷》条目)一文,准确系统地阐释了这一概念的来龙去脉,科学地界定了统一战线的内涵: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为实现一定的战略任务或反对主要敌人,同其他国家或其他阶级、阶层、党派、社会团体以及一切可能团结的社会力量结成的联盟。统一战线的根本问题,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自身统一、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和团结同盟军的问题。《认真研究新时期的统一战线与工人阶级内部统一战线问题》、《工人阶级内部统一战线与我党处理国际关系的四项原则》、《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工人阶级内部统一战线》、《无产阶级族际主义和工人阶级内部统一战线》、《我国工人阶级大团结和工人阶级内部统一战线问题》等5篇文论,集中论述了统一战线问题,特别是从各个侧面系统论述了工人阶级内部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这在科社学界还是很有特色的。

——在论述马克思、恩格斯的巴黎公社原则问题时,提出了“要正确认识巴黎公社原则”的命题。针对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将巴黎公社原则概括成某一个原则,比如认为巴黎公社的原则就是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而必须将其摧毁和打碎。作者查对了马克思所说的“公社原则”这一概念的英文(The Principles of the Commune)、德文(Die Prinzipien der Kommune),都是复数,而中文翻译为“这些原则”表明也是复数,所以断定马克思所讲的“公社原则”不是仅指某一原则,而是指一系列重要原则的综合。特别指出:公社原则是打碎旧世界和建设新世界两个层次的一系列原则的有机统一。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属于打碎旧世界的原则,建设巩固新的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由人民当家作主,取消特权,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是建设新世界的原则。而后者对于现实社会主义各国更具有直接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

——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战略策略学说,一直是作者比较重视的课题。教学中长期讲授它,编写教材时这方面的内容也亲自撰稿,该问题也是自己科研的重点之一。特别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战略策略与社会主义建设战略策略之比较”的研究,在我国科社学界,可以说是最早、也可能是唯一的。上世纪80年代初,作者研究这一问题的成果,先在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广州讲习班”上作了专题报告,后被收入中国人民大学编辑的《社会主义论丛》一书。大百科《科学社会主义卷》重点条目之一“无产阶级政党战略策略”由我撰稿。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创新性地阐述了如下问题:“战略与策略”范畴科学释义,并指明“战略与策略”在马克思、恩格斯和1920年前列宁的著作中尚未加以区分,而统称“策略”,1920年,列宁所写《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并列使用这两个概念;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战略与策略学说的形成发展、主要内容和基本指导原则;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战略策略与社会主义建设战略策略之比较,指明并系统论述了二者的同中之义和异中之同。

——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科学的学科建设问题,作者也作出了一些贡献:把党学原理、党学史、党建学、党管学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科学的分支学科,对上述四个分支学科的研究对象作了科学界定。指出:党学原理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本质特征及其一般发展规律的科学;党学史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及其继承、捍卫、发展者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的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一般发展规律的科学;党建学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建设规律的科学;党管学是一门应用学科,它是依据党学原理与党建学提供的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政策,对党务工作中正反两方面的丰富经验进行科学概括与总结,着重研究党务管理工作的准则、规范与方法,简言之,它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身管理的本质及其规律的科学。同时,还构建了上述四个分支学科的理论体系。

关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方面的学术贡献。

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有:《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问题研究》、《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谛》;代表性论文是:《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谛》、《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成就经验和面临的挑战及对策》、《中国工人阶级在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于我党现行党章中民主集中制问题的若干思考》、《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中正确识别与克服“左”右错误倾向的正反历史经验问题研究》、《论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干部》等。在这些著作和文论中,作者提出了一些富有新意的学术观点。比如:

——提出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概念的科学内涵,是“四要点有机统一”的命题。“四要点”是指:(1)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中国化,即带上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比如,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人民主体、领导服务”,“独立自主、对外开放”,都是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中国特色。(2)当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具体论断与中国国情不相符时,不生搬硬套,而从中国国情出发,实事求是地创造新理论,来解决在中国发生的新矛盾和新问题,从而既将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又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增添新的内容。(3)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某些已过时的论断或原理,敢于承认过时并在实践中予以放弃,进而结合新的实际创造适合时代特征的新理论,实现马克思主义当代化。(4)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的过程中加以具体化。

——解读了为什么斯大林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而同意“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提法的问题。作者指出: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两种提法虽有一定区别,但基本相同;而在斯大林看来,两者的提法根本不同,前者是马克思主义问题上的民族主义的表现,后者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各民族具体实际相联系,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表现。不仅如此,斯大林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联系,同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解也有区别。比如,斯大林认为在工人阶级集中的大城市举行武装起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原理和普遍规律;而中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就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在斯大林看来,“中心城市武装起义”这一普遍规律在中国具体化,就是在何时、何地、如何具体地实行武装起义,即“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

——提出了“实事求是与教条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两种传统”的命题。作者指出:在漫长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形成了两种传统:一是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一是“左”右倾教条主义的不良传统。从我党的整体来说,前者是主流,后者是支流,前者是在同后者的斗争中成长发展起来的,它已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宝贵财富。在党的创立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代表我党实事求是优良传统的是李大钊和毛泽东,代表右倾教条主义不良传统的是陈独秀。在第二次、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代表实事求是优良传统的是毛泽东,代表“左”右倾教条主义不良传统的主要是王明(即陈绍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上述三个时期,在英勇的革命实践和艰苦的理论创新中,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学”。

在这里,作者特别解读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民主革命时期一直坚持实事求是优良传统、反对“左”倾教条主义的典范——毛泽东,而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却成为“左”倾教条主义严重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相反,张闻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犯过“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而在社会主义时期则成为抵制毛泽东“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著名人物。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条规律性东西是必须提及的。这就是在革命的某一历史阶段,能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创造性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并不能保证一劳永逸,永远如此;如果经不住不断革命、不断胜利的考验,被胜利冲昏头脑,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就会因胜而骄,特别是党的主要领导人,甚至

会陷入个人迷信的泥沼,从而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犯“左”右倾教条主义的严重路线错误。斯大林和毛泽东是这方面的典型,是国际共运中的两个悲剧性人物。这是此种规律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即如果因不深入实际,不深入群众,不勤于调查研究,只满足于书本上的道理,而曾犯过教条主义的严重路线错误者,而之后在党的领导集体帮助下,认真总结和汲取教训,一改过去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作风,横下一条心,深入实际大搞调查研究,使自己的世界观、方法论得到彻底革新,那么,他也会成为科学地坚持和创造性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本国化当代化的模范,成为实事求是优良传统的实践者和捍卫者,在我党历史上,张闻天是这一方面的典型。简言之,由正确的典型变成错误的典型和由错误的典型变成正确的典型,关键就是两条:一是谦虚谨慎,还是因胜而骄;二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还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两条之中,关键是第一条。毛泽东自己说的对:“骄傲使人落后,谦虚使人进步”,这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真理,在毛泽东从正确走向错误和张闻天从错误走向正确的事实面前,印证得十分正确和深刻。

——提出和论述了以主要创立者名字命名的党的指导思想正负效应问题。作者指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邓小平理论”都是在本人逝世后或病危时,后人为了尊敬、悼念其而用他们的名字命名的,只有“毛泽东思想”是在毛泽东健在时就以其名字命名并载入党章的。在主要创立者健在时,以其名字命名的党的指导思想确实存在着两重性,即正负效应问题。正效应集中表现在较易于将正确的指导思想这种非权力性影响,同处于党的主要领导地位的决策人之权力性影响紧密结合起来,形成党的思想、政治、组织的优势,以保证党对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正确领导;负效应主要表现在主要领导者本人和整个领导集体,如果头脑不清醒,易于犯突出个人、乃至个人迷信的错误,损害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正因如此,所以马克思、列宁在世时皆拒绝以他们的名字命名,毛泽东在以他的名字命名为“毛泽东思想”并载入党章后,也一再提醒要谨慎,要谦虚,而且建国后至党的八大前,一再建议党的正式文件上不再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当然,如果主要创立者、党的领导集体、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乃至全体党员,切实用唯物史观关于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杰出个人可以发挥巨大作用的思想所武装,并能做到清醒而坚定,那么上述负效应也会被消除,至少可以降到最低限度。

——提出和论述了“准确把握党的指导思想的科学内涵”的命题。作者指出以“主义”、“思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个人名字命名的党的指导思想,存在着一个主要创立者个人的全部论述与党的指导思想的关系问题。党的指导思想的内容结构有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作为主要创立者杰出领袖个人全部论述中的那些经过实践证明是科学的,并具有相对普遍意义的理论原理和策略原理;第二部分是参与创立的其他杰出个人之论述中的那些被实践证明具有科学性并有相对普遍意义的理论和策略原理。这两部分之关系不是机械相加而是由主要创立者加以吸收并升华为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又由灵魂或精髓、基本原理或原则、具体论断或个别原理几个层次所构成:一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立场(工人阶级为代表的最大多数人的立场)、观点(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以及以此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自然观、思维观、社会观、资本主义观、社会主义观、共产主义观等世界观体系)、方法(唯

物而历史的辩证的方法),这些属于灵魂或精髓的普遍真理在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中,则具体化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等。二是与精髓或灵魂这类普遍真理相比,属于下一个层次的基本原理,如马克思主义关于夺取政权的基本原理(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等),关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原理,关于社会主义本质与社会主义建设、改革的基本原理,关于共产主义本质与社会主义成长为共产主义以及共产主义建设的基本原理,等等,这类基本原理具有历史阶段性质。当一个历史阶段的使命实现后,这类基本原理便成为过去,失去作用,只是其中贯穿的第一层次,即精髓、灵魂性的东西对后一阶段仍保有指导价值。三是具体论断或个别原理,通常是指对当时、当地、具体条件下的个别问题、特殊问题的论述与回答,它们既不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属性,也不具有一个大的历史阶段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原理特性。由此可以看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是指第一层次、有条件地包括第二层次的内容,第三层次的内容只是党的指导思想在解决个别问题时的具体运用。简言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之立场、观点、方法或称为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体系的内容,才是工人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之科学内涵。

——关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问题。作者认为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和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理论这样三个部分。作者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对马克思、列宁新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和过渡时期理论所作出的独创性贡献概括为如下十多条:关于中国特殊社会性质的科学判断和论证;关于中国革命特殊性质的科学判断和论证;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主要经验——“一个战士”、“两大武器”的“三大法宝”之科学概括与论证;关于破除“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教条,独创性地走出“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和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的科学论证;关于打破“土地国有制”框框,实行土地归农民私有的土地革命路线的科学论证;关于突破适合一般战争规律与一般革命战争规律的军事学说及其战略战术的框框,独创了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殊规律的军事及其战略战术体系的科学论证;关于冲破“中间势力是最危险敌人”的教条,独创了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等中间势力建立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的科学论证;关于冲破斯大林之“党员的工人成分应达到最大限度的清一色”的教条,独创了通过“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来保证中国在农村根据地环境与红军中农民成分为主特殊历史条件下建党,仍能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建党理论和政策”的科学论证;关于工人阶级政党政治战略策略的科学含义、研究对象和一系列指导原则的科学论证(毛泽东提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战略是研究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全局指导规律的科学,策略是研究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局部性指导规律的科学,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战略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等等);关于论述新民主主义社会是提出的‘旧政治、旧经济、旧文化和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六个概念的科学概括与论证;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文化的科学概括与论证;关于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科学判断与论证。

——关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大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问题,作者将其概括为“十三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对象论——关于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改革、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规律的科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路线论,揭示了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有机统一的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揭示了本质的统一性与体制模式的多样性有机统一的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论,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各国国情、国际普遍经验与各国具体实践,以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曲折性与前进性有机统一的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揭示了社会主义的长期性与阶段性有机统一的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揭示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在一定历史阶段可以相结合的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三个代表”论,揭示了社会主义的科学观与价值观有机统一的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社会主义建设与科学发展论,揭示了以人为本、建设与发展的重点性、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有机统一的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社会主义发展动力论,揭示了矛盾与改革、必然代替(资本主义)与必须利用(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有机统一的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力量结构论,揭示了领导力量与依靠力量有机统一的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国际战略论,揭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国际性与独立自主性有机统一的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领导核心论,揭示了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之坚持、加强与改革、改善有机统一的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共产主义目标论,揭示了实现共产主义目标的遥远性与为分阶段目标奋斗的现实性有机统一的规律。

——最早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真谛”的命题。作者在1999年承担教育部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组编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丛”之一,其书名定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谛》。作者指出:这一命题是针对如下情况提出的,即有人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主观上随意解释和发挥,把这一理论本不包含的意思或道理强加于它并加以传播。那么,何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谛”呢?“真谛”,即指真实意义或含义,也就是真实的道理。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谛,就必须忠实于邓小平对这一理论论述的原意,深刻理解其精神实质。邓小平如下两段论述对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真谛有重大意义:一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二是“我们多次重申,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这两段话,朴实无华,通俗易懂,含义十分清楚,道理非常明白,要点就是两条:一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社会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二是符合中国国情、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点,二者缺一不可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要把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谛”,从基本内容上说,最重要的是要弄清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包含的三个基本关系:一是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间的关